

的地點設立食宿站。完善的籌畫和執行遣返計畫效率至關重要，因為從中國戰區撤離的日本人數量龐大，又需要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

留在中國的日本人可能扮演何種角色，他們的影響重要程度如何，這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題。但在最近的將來，留下的日本人通過直接參與中國事務而在中國舞臺上所起的影響，似乎未必能成為一種重要的因素，除非由於滿州可能存在大量的日本軍事人員而使事物的發展出現這種情況。

十九. 軍事調處執行部執行小組進入滿州；滿州的局勢

按照 3 月 27 日就軍調部執行小組進入滿州達成的協定，白羅德將軍和少數的美國人員於 3 月 29 日經由錦州前往瀋陽。在軍調部接到這項協議的通知時，白羅德將軍在取得參加軍調部的中國雙方同意派遣執行小組進入滿州方面遇到了困難。中國共產黨方面聲稱，那個時候它缺少充分的人員，而國民政府方面聲稱，蔣委員長在錦州的行營沒有接到關於這項新協議的通知，因此不能與軍調部洽辦此事。

蔣委員長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將軍於 3 月 28 日通知參加軍調部的國民政府代表說，執行小組不得進入滿州。不可避免地會引起這樣的懷疑，即國民政府的官員們有意地使這件事情耽擱下去，以便阻止執行小組進入滿州，直至國民政府有佔領長春的時間。這種懷疑，顯然被國民政府一位參加軍調部的高級成員與白羅德將軍的談話所證實了。國民政府的軍事領袖們擔心，執行小組會停止他們軍隊的調動，因而阻止政府佔領長春（蘇聯軍隊不久就將從長春撤退）。在吉

倫將軍就此事與張治中將軍和蔣委員長交涉之後，蔣委員長於4月1日向熊式輝將軍發出命令，要他與軍調部滿洲執行小組充分合作。

3月30日，美國和國民政府參加滿洲執行小組的人員前往瀋陽，4月2日，共產黨參加滿洲執行小組的四十名成員抵達該城市。此後不久，共產黨與美國在瀋陽的小組成員之間就派遣小組進入戰地達成了協議。然而，4月3日，國民政府的小組成員聲稱，他們沒有權力採取行動，因為他們小組的領導人還在錦州。雖然作為軍調部執行組主任的白羅德將軍有權按照發出的命令規定派遣各小組進入戰地，然而如果沒有國民政府的代表參加，小組就難以離開瀋陽。鑒於執行小組在滿洲的活動面臨著這個持續存在的障礙，吉倫將軍於4月7日送一份備忘錄給蔣委員長。在備忘錄中他描述了上述局勢，提到了報紙的報導，即政府是在故意拖延，以便它有時間佔領長春，並要求蔣委員長立即發出適當的訓令，以保證國民政府在瀋陽執行小組成員的合作。

這時滿洲的局勢由於與蘇聯從該地區撤退有關的發展而複雜化了。在蘇聯軍隊從瀋陽撤退以後，在滿洲的蘇聯軍事當局拒絕同意國民政府利用向北通往長春的鐵路運送中國軍隊，宣稱這是中蘇條約條款所禁止的。又據報導，蘇聯當局已拒絕了中國政府的一項要求，即在蘇軍正在撤退的若干據點保留少數蘇聯駐軍，直至國民政府的軍隊到達這些地方接收主權。中蘇關係由於經濟談判的情況而更為複雜。這項談判由於蘇聯的要求在長春開始舉行，但是由於蘇聯在2月1日（這是要求蘇聯軍隊撤離滿洲的日期）以後繼續佔領滿洲的結果，中國的談判代表離開了長春，使談判陷於停頓。此後蘇聯政府曾要求中國當局在長春繼續討論有關滿洲的經濟事務，但是後者拒絕參加這種討論，除非討論移往重慶舉行。事情就這樣陷於停頓，直至3月25日，蘇聯駐華大使通知

中國政府，蘇聯政府願意在重慶進行在滿州的經濟合作問題之討論。

軍調部執行小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前往瀋陽的。4月5日，中國當局送給吉倫將軍一份蘇聯從滿州撤退的時間表，這是蘇聯在滿州的當局提供給中國政府的。時間表規定，自4月6日開始至4月29日止，蘇聯軍隊應逐步地並完全地從滿州撤退。鑒於蘇聯軍隊繼續駐在滿州，即使3月27日的協議已經明白規定，執行小組不得前往蘇聯佔領下的地點，白羅德將軍還是向吉倫將軍建議，把執行小組進入滿州一事，正式通知蘇聯在滿州的軍事當局應當可行。於是吉倫將軍於4月1日向蔣委員長建議，由國民政府把執行小組進入滿州和派它們進入滿州的目的——即履行3月27日的協議——通知蘇聯當局。4月4日，中國當局通知吉倫將軍，蔣委員長已命令熊式輝將軍，把派遣執行小組進入滿州和指導它們活動的指示，通知蘇聯在長春的司令部。

滿州局勢的另一方面，即中國共產黨時常以之作為宣傳攻勢主題的，是與以美國交通工具運送國民政府軍隊有關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期間，共產黨第一次力圖證明它的爭論是正當的，即國民政府在滿州的軍隊數目被限制為五個軍，這個限制是2月25日達成的軍隊整編和統編協定規定的。3月28日，軍調部的共方委員抗議政府軍隊開入滿州。3月31日，周恩來將軍以三人小組的共產黨代表資格向吉倫將軍提出抗議，反對再用美國船隻運送政府軍隊進入滿州，聲稱2月25日的軍隊整編方案把政府在滿州的軍隊數目限制為五個軍。吉倫將軍答覆說，這個爭論的根據是不正確的，因為在軍隊整編方案裏所規定的對政府在滿州的軍隊限制在十二個月終了時方才生效，而政府軍隊開入滿州，是1月10日的停戰令裏所規定的。這項規定使禁止軍隊調動有一項例外，以便允許政府軍隊開入滿州，以恢復中國的主權。吉倫將軍並且

請共產黨方面注意這個事實：即使五個軍的限制適用於還很遙遠的時期，當時政府在滿州的軍隊總數還遠遠低於在五個軍的基礎上所准許的人數。雖然這個主題暫時被擱置了，但是這個問題此後還是被共產黨三番五次地提出來，並且在它反對所謂「美國幫助國民黨」的宣傳攻勢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就執行小組進入滿州達成協定時，有這樣的打算：三人小組將訪問瀋陽，以便幫助決定哪些地區是危急的，並且在三人小組認為必要時，對執行小組的地點加以調整。然而，直至4月8日，在瀋陽的執行小組才就派遣小組進入滿州發生衝突的地區達成最後協議，那一天兩個執行小組被分別派遣到瀋陽的北方和東南方地區。4月14日，代理三人小組（國、共、美三方各有一位代理人，代表三人小組原來的成員）與軍調部的三位委員一道，離開北平前往瀋陽，進行一次調查局勢的視察，以便在我從美國返華後可以把滿洲的實際情況向在重慶的三人小組彙報。這次的視察實際上成為一次調查事實的遠行，因為執行小組留在發生衝突之地區的時間太短，不可能獲得任何有效的結果。代理三人小組於4月16日回到北平，並於4月18日前往重慶。

4月14日，蘇聯軍隊從長春向北沿鐵路線撤退到哈爾濱。在蘇軍撤退後一個小時內，該地區的中共軍隊就對飛機場開始攻擊。次日，中共軍隊向長春發起進攻，並於當日攻下了市區裏的主要據點，雖然零星戰鬥一直繼續到18日（這一天國民政府軍隊的所有抵抗都停止了）。據報導，中共軍隊約有兩三萬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士兵，抵抗他們的國民政府軍隊約有一萬五千名士兵，其中大部分是以前的滿州偽軍，是在蘇聯佔領期間從北平飛往長春的。據一名官方的美國觀察員報告，中共軍隊在交戰時曾雇用了少數日本人，其中主要是坦克手。這位觀察員又報告說，在長春陷落以前，國民政府軍隊殺死了三十多名蘇聯公民，在這次屠殺中有些

蘇聯公民被拷打和切斷肢體，在中共軍隊佔領長春以後，蘇聯官員和大部分有地位的蘇聯公民離開長春，前往哈爾濱。

中共進攻並佔領長春是對停戰令的重大違犯，而且如後來的發展所顯示的，是會引起嚴重後果的行動。這個行動使在滿州取得勝利的共產黨將領們過於自信，並且更不願意同國民政府妥協，但是這個行動對於國民政府的影響更是災難性的。這個行動使我原本在談判中的地位和自始至終的努力方向——即說服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領袖們，採取某種妥協的行動方針是可取的——變得更加困難。這個行動大大加強了國民政府中極端反動集團的勢力，他們現在能夠批評我以前的勸告，並且說，共產黨現已表明他們從來沒有打算堅持履行達成的協議，這種說法始終是這些國民黨領袖提出的論點。

要確實地解釋共產黨進攻長春的原因是困難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共產黨力圖迫使國民政府結束在滿州的衝突，停止把它的軍隊從瀋陽向北調動，並且從事談判以求得一項解決辦法。

這個解釋由於中共軍隊在四平街（瀋陽以北鐵路線上的一個重要交叉點）進行的堅決抵抗而加強了，在那裏中共軍隊成功地抵禦了強大政府軍隊的進攻達一個多月之久，該城市最後於5月19日被政府軍隊攻佔。共產黨進攻長春的行動也可以同華北的一般局勢聯繫起來。在華北，鐵路重建工作在成功且有希望的開端以後，接著卻在對剷平毀壞防禦工事問題的辯論中陷於停頓。政治形勢也明確地惡化了，有跡象表明，國民黨力圖對政治協商會議於1月作出的各項重要決議進行修改。因此，共產黨可能希望，這個時刻它在滿州成功的軍事活動，連同華北正在惡化的局勢以及共產黨努力阻止國民政府再把軍隊開入滿州，可能會使國民政府更願意

從事談判，以求得滿州問題的解決辦法。但是，不管這個行動的原因是什麼，它顯然是共產黨方面一個策略上的嚴重錯誤，這個行動今後將反覆地煩擾他們。

周恩來將軍對於共產黨進攻長春的解釋是：在 1945 年底，當政府軍隊正在沿鐵路線從錦州向瀋陽前進時，共產黨曾力勸政府前往瀋陽同蘇聯人談判關於接收主權的事，並且曾經通知政府，如果政府軍隊為了接收在蘇軍控制下地方的主權而向瀋陽前進，共產黨不會阻攔。周將軍解釋說，曾經警告政府，如果它的軍隊向西調動，進攻共產黨的軍隊，就會有發生衝突的危險。他進一步說，政府軍隊改變了進軍路線，並向西對熱河發起進攻；甚至在 1 月份簽訂了停止衝突協議以後，曾再一次要求政府不要進攻共產黨。周將軍說，遲至 3 月 15 日，共產黨還曾力勸政府接收瀋陽和中長鐵路，3 月 27 日，他本人曾經聲明：如果在滿州的衝突停止了，「可以向政府保證維持長春、哈爾濱和其他城市的現狀」。他最後說，共產黨曾一貫地向政府保證，如果政府停止滿州的衝突，長春可以一直維持到 4 月 15 日，但是政府不願這樣做——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除攻佔長春外沒有其他選擇。

二十．在我回到中國時局勢的惡化；各種事件導致達成滿州臨時休戰協定

我於 4 月 18 日回到中國時，局勢全面惡化了。我在北平短期停留，瞭解與軍調部活動有關的情況以後，前往重慶。

當我回到重慶，便立即與蔣委員長舉行第一次會談；他就全面的局勢作了一次坦率的談話，其大意是：現在我應該清楚了，我以前爭辯說，共產黨會履行他們的協定，是錯誤